

The Dislocation of Signifying Practice: from Ireland to China--as Exemplified in "The Charwoman's Daughter"

Yang Wang

College of Lit. & Journalism,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610000, China.

wyscu2014@163.com

Abstract. For a long time, domestic academia has not paid enough attention to James Stephens's *The Charwoman's Daughter*. It is because of the dislocation of signifying practice that researchers misplace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novel in the realistic literary framework. By restoring the context of Irish national literary revival, this paper reinterprets the literary value and social cultural significance of *The Charwoman's Daughter*, which is intimately connected with Irish imaginary national community. And on this basis, by using cultural sociological methods, this paper meanwhile analyses the dislocation of signifying practice of *The Charwoman's Daughter*. What the paper aims at is 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this dislocation on educated youth during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

Keywords: "The Charwoman's Daughter"; quasi-realism; national community; signifying practice;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

指实践的错位：从爱尔兰到中国——以詹姆斯·斯蒂芬斯的《玛丽玛丽》为例

王洋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成都，中国

摘要：长期以来，国内学界对詹姆斯·斯蒂芬斯的《玛丽玛丽》缺乏应有的关注和研究。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意指实践的错位导致《玛丽玛丽》被局限在了现实主义的文学框架中。本文通过对爱尔兰民族文学复兴语境的还原，重新阐释了《玛丽玛丽》的美学价值和社会文化意义，并指出了小说与爱尔兰想象的民族共同体之间的紧密联系。在此基础上，本文又对《玛丽玛丽》的错位意指实践进行了文化社会学分析，探讨了它对五四知识青年产生的社会文化影响。

关键词：玛丽玛丽；拟现实主义；民族共同体；意指实践；新文化运动

1. 前言

《玛丽玛丽》[1] (*The Charwoman's Daughter*) 是爱尔兰作家詹姆斯·斯蒂芬斯 (James Stephens) 的代表作之一。但长期以来，国内学术界较为重视的却是作家的其他几部作品，如《金坛子》 (*The Crock of Gold*)，《半人半神》 (*The Demi-Gods*) 等。即便是在陈恕教授对国内爱尔兰文学研究和翻译现状进行全面回顾的长篇论文《爱尔兰文学在中国——世纪回眸》中，詹姆斯·斯蒂芬斯的长篇小说《玛丽玛丽》也未被提及。[2]而在哈罗德·布鲁姆 (Harold Bloom) 主编的《都柏林文学地图》[3]中，对《玛丽玛丽》的介绍也只是浮光掠影的一笔带过，并未给予应有的重视。在本文看来，学术界之所以缺乏对这部小说的研究主要出于以下两方面原因。一方面，学术界一般将詹姆斯·斯蒂芬斯及其作品放置在了爱尔兰民族文学复兴的文学、文化框架内进行研究。但问题在于，这种直观视域导致了首要研究对象是与爱尔兰文学中的民族性问题外在关联更为紧密的作品。举例来说，斯蒂芬斯运用爱尔兰本土神话、传说、民间故事等文化元素创作的《金坛子》和《爱尔兰神话故事》 (*Irish Fairy Tales*)，由于显著地表征了作家对爱尔兰民族文学和文化身份的理解和探索，所以成为学界最适宜研究和阐释的文学文本。另一方面，学界又往往把这样一部带有部分现实主义特色的

作品固化在了现实主义的文学背景中。与英国成熟而丰富的现实主义文学实践相比,《玛丽玛丽》的艺术创造力和艺术价值自然显得不够分量。但事实上,仅仅以现实主义研究《玛丽玛丽》的文学价值和审美特点显然遮蔽和弱化了这部长篇小说内在的丰富文学意蕴,并且无益于学界对《玛丽玛丽》在爱尔兰民族文学复兴史中所具有的文学地位进行更为全面地审视。因此,带着这样的反思,本文将重新诠释《玛丽玛丽》的美学价值,并对詹姆斯·斯蒂芬斯的文学民族性做出新的思考。而在此基础上,本文将探讨《玛丽玛丽》的错位意指实践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文化社会学意义。

2. 民族共同体的现象——拟现实主义的美学风格

拟现实主义是一种对现实主义的不完备或变形的模仿,即文学作品在显文本中有意无意地消解掉了传统现实主义力图在世界内部寻找具有广度和深度的历史逻辑的冲动,而潜文本则对“现实”进行一般界定的可能性抱有一种深刻地怀疑和批判倾向,并从内部重构对现实主义的理解;就艺术技巧和文体风格来讲,爱尔兰民族复兴文学对此最通常地呈现方式是浪漫主义式的历史、神话、民间传说和神秘文化相互结合。不过,在《玛丽玛丽》中,詹姆斯·斯蒂芬斯并未采用这样的典型处理方式。尽管小说运用了与英国经典现实主义相通的叙述手法,从而营造出一种逼真的现实氛围;但作家在显文本中最大限度地简化和弱化了文学意义的丰富性。小说的时空背景相对模糊,整体故事情节也简洁明了,貌似缺乏与历史主义的有机联系。因此,从表面上看,拟现实主义的美学风格使得《玛丽玛丽》不能与作家的《金坛子》相提并论,被经典化为爱尔兰民族文学复兴的代表性作品。但实际上,《玛丽玛丽》拟现实主义的表现方式不仅在爱尔兰民族复兴文学中独树一帜,这部小说的文体特征还与爱尔兰深层的民族历史紧密联系在一起,从而在潜文本中最大限度地构建起了爱尔兰文学对民族共同体的想象。

《玛丽玛丽》以一句内容简洁的话语开篇:“玛丽与她的母亲,莫须有太太,住在一所高大的黝黑的房子的顶上一间小屋里,在都柏林城里的一条后街上。”(第2页)在这里,小说的空间背景被设置在了都柏林,但时间背景没有交代。而且,通读全文,小说也没有给予时间任何确定的叙述。从这句话中,爱尔兰读者能够理解并产生情感共鸣的是,玛丽从小就住在一个破旧的小房间里。而从稍后情节可以得知,玛丽对于屋内每一处衰颓与凋败的细节都了若指掌。值得注意的是,小说的第二句就出现了时间性状语“从小”(第2页[4]),这是一种生活经历和时间性体验的交叠。当都柏林城市的水平空间还没有随着小说的展开而立体化时,它就像一个临时搭建的舞台。阅读者在其中所感受到的不再是个体化的生命历程,而是在这一水平空间的都柏林舞台上演出的每一位贫民的生活画卷。因此,一种想象的共同体开始在小说中孕育。在这种时空关系中,小说的意义世界则如宇宙内爆般地在文本内部形成。正如因为贫穷,莫须有太太每天起床并非依靠钟表所标示的客观时间,而是“一听得隔壁房间出来迟重的脚步声走下楼梯去,她就知道她应该起来了。隔壁有一个工人和他的妻子、六个孩子住着。(第9页)”时间性的体验不只是在解释莫须有太太个人的作息习惯,而是宣告了都柏林绝大多数贫苦家庭平凡、琐碎的日常生活的开始。而隔壁的家庭情况,则是爱尔兰成千上万个家庭的共同缩影和真实写照。于是,爱尔兰读者经历的个性和共性紧密联系起来,从而释放出关于爱尔兰生活的全部真实性。与此同时,缺乏历史逻辑的时空标记,散布于女主人玛丽在爱尔兰街头的每一次漫步和游逛。圣斯蒂芬公园、葛莱夫登路、奥康内路、约翰逊珠宝铺、梅里昂广场、圣安德鲁的教堂、南城市场、哈科特街……这里存在着对都柏林每一寸土地,每一片草木的全景式描绘和女性直觉观感的细节描写,但唯独没有像现实主义那样在时空交错中赋予任何事物以任何真正的历史内涵。不过,正是这一文体特点,赋予了《玛丽玛丽》最广泛的共同体想象。每一位在圣斯蒂芬公园畅游和休憩的都柏林市民,每一位以类似于玛丽的心态注视着街道两旁的店铺和建筑的穷苦大众,都将会在阅读《玛丽玛丽》的过程中意识到并确认彼此之间的联系。基于此,斯蒂芬斯拟现实主义的美学风格不得不受到应有的重视。它的艺术价值不仅仅在于以文学技艺的手法竭力保持了时空的简约,更

在于从美学和思想的时空形态中尽力抵制了历史主义的诱惑。毕竟，以后现代主义的学术视角审视，贯穿于一部现实主义小说的历史思想往往吊诡地既伟大又渺小。因为文本叙述出来的历史逻辑在体现了一位真理探索者的智慧之光时，也展现出了其视野和依据的偏狭、脆弱。更为重要的是，这将会在爱尔兰破碎历史的显微镜下放大成为一个阻碍爱尔兰民族文学复兴的致命弱点。只需回顾一下当叶芝(W.B. Yeats)和辛格(J.M. Synge)对爱尔兰农民进行理想化的凯尔特式文学重塑时，他们受到爱尔兰本地农民广泛敌视的情况，这一点便不言自明。

[5]

与此同时，印刷资本主义与斯蒂芬斯文学建构的想象共同体已然结合，并为文学中民族共同体观念的实体化逐步奠定了基础。自1905年以后，“他（指斯蒂芬斯）的散文和诗歌就经常出现在《爱尔兰人联合会》和格里菲思的第二份杂志《新芬党》上面。”[6]这其中的历史意义已由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在对民族意识起源的杰出研究中指出：图书出版业的飞速发展使得印刷资本主义仅仅在150年的时间内就使得拉丁语的阅读市场逐渐饱和。而“资本主义的逻辑因此意味着精英的拉丁文市场一旦饱和，由只懂单一语言的大众所代表的广大潜在市场就在招手了。”[7]于是，地方方言取代拉丁语的过程徐徐地展开了它的帷幕。也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詹姆斯·斯蒂芬斯的盖尔语写作与他在小说中建构的想象共同体一道，随着其文学作品的不断出版，共同促进了爱尔兰文学中民族观念的形成和深化。

因此，虽然正如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所指出的那样，爱尔兰文学传统中经典现实主义的缺失与爱尔兰不具备稳定的资产阶级存在着内在联系；[8]但是，如果从民族角度分析，这样的社会现实反倒激发了斯蒂芬斯天才的文学创作——拟现实主义对民族共同体的想象在最大限度上引起了爱尔兰多样化的接受群体的集体意识共鸣。从城镇到乡村，从资产阶级到天主教贵族、从爱尔兰本土文化到英国文化，斯蒂芬斯拟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不仅对爱尔兰各种狭隘的文化心理和文化现象保持了最大程度的宽容和耐心，还为相互排斥的异质性因素提供了一个统一的经过有意整合的共同体平台。可以这样讲，爱尔兰历史的支离破碎、稳定资产阶级的缺乏以及民族主义政治的方兴未艾正是形成拟现实主义美学风格和思想的根本原因。在这个意义上，仅凭《玛丽玛丽》一部作品，詹姆斯·斯蒂芬斯便可以当之无愧地被称为爱尔兰民族文学复兴运动的杰出代表。

3. 爱情与饥饿——民族文化的理想性允诺

在詹姆斯·斯蒂芬斯的文学实践中，女性已经突破了爱尔兰民间文学传统的限定性，展现出丰富、微妙、复杂的文学意义。而这种创作特点的形成，与作家对于爱情的理解和民族命运的思考联系在一起密不可分。在《玛丽玛丽》中，女主人公对事物的感受和把握具有非常鲜明的特点。

“公园里的鸟雀她全认得，有的已经生了小鸟，有的正怀着小鸟的，有的从来没有生过小鸟的——最后的一种大都是雄的，它们自有它们不生小雀的道理，玛丽却是不懂得，她只是可怜它们没有孩子……”（第9页）

“真的，这时玛丽对于衣服的趣味远超过她所知道的别种趣味。……并且她能很聪明、奇怪地知道关于线或缝边的显明的、微细的、但是非常重要的差别，分别出这一件衣服是属于时新的，而它的隔壁一件只不过属于寻常的。”（第151页）

女主人公对外在的感知是天然的，对小鸟的分类不是知识学意义上的。没有任何知识前提对她的理解视域进行遮蔽和分割，就连对于服饰的思考和判断也仅仅是依靠一种直觉性的、敏锐而又细腻的日积月累的观察。这种女性特点实际上是斯蒂芬斯有意刻画出来的。在《金坛子》中，作家表达了与之相应的观点，“在两性从未结合时，男人的特质是思想，女人的特质是直觉。两性之间存在着名为恐惧的深渊，而他们所恐惧的，正是各自的力量将因结合而被夺走，从而不再是各人命运的主宰。”[9]在小说中，与女性形成尖锐对比的是玛丽暗恋的巡警对事物的感知形式。

“他告诉她凤凰公园所以称为凤凰公园的缘故。……现在他才想起，以前他从没有想过要专程调查这一类鸟，但是下次他再到动物园去倒要留心考察考察。……他又告诉玛丽，这个公园是世上最大之中第三个，却是最美丽的。……本地新闻的意见也许因为爱国而有什么偏见——偏见就是背乎实在的真理的意见——还有著名的英国报纸上许多可靠的证据……他用多少里、多少码、多少亩来说明这个公园的正确的大小……经济租田这个名词是一个深邃的——是一个奥妙的、困难的科学与社会学名词。”（第 52、53 页。）

一种道听途说的、晦涩不解的知识辞藻堆砌、混合起来，构成了巡警自信的聊天内容和讲述方式。在这种强烈的对比中，男性的言述和思考方式受到了极大得讽刺。这位可怜的巡警最终也因为无法越过“恐惧的深渊”来超越自己矫饰的自尊和嫉妒之情，受到了玛丽和莫须有太太对其求婚的回绝；但不可否认地是，在斯蒂芬斯看来，这的确是男性所无法改变的宿命性的根本特质——思想。小说中与玛丽一家邻住，并与玛丽终成眷属的小伙子，虽然在一场被偷袭的打斗中战胜了妒火中烧的巡警，即一类作者认同的男性战胜了另一类狂妄无知的男性；但“思想”的特质仍然以另一种形式顽强地生长出来，“现在他的饥饿已经没有了，他以为其余的一切也都没有了……他将这话告诉玛丽，但她没有听……结果他只好闷声不响地傍着玛丽走，听她的计划、她的反复的心意……”（第 195 页）两位男性外在的差异之处在于，一位热衷于滔滔不绝、旁若无人地演说，而另一位则能够在倾诉之余虽心有不甘地耐着性子倾听。斯蒂芬斯相信，只有基于此，两性之间才存有了在爱情中跨越鸿沟并合为一个整体的可能性。

纵观小说，斯蒂芬斯始终在竭力营造拟现实主义的美学风格并拒绝历史主义对文本的渗透。但在小说的结尾几章，大段大段的叙述者评论还是以具有历史逻辑的现实主义形式涌现出来。因此，一方面，从拟现实主义统一性的角度评价，斯蒂芬斯的创作手法显然尚未臻于完善；但另一方面，这也意味着贯穿于小说的核心主题之一——爱情便不仅仅是一种自我指涉的存在，即对于两性爱情的爱尔兰民族文化解读获得了令人信服地支持和依据。

饥饿和饥饿感一直是斯蒂芬斯在文学实践中持续关注主题之一。《玛丽玛丽》对于两性爱情的描写同样自始至终与饥饿和饥饿感联系在一起。当莫须有太太因病不能工作时，母女俩便短暂地面临过饥饿的困境。对于莫须有太太来说，被迫让玛丽出去工作不仅是母爱的失责，也意味着一种堕落生活的开始。“她知道这种工作就是堕落，将她女儿的生命的前途扩充到萧条、穷困的地平线上，在这地平线内的云彩就是肥皂水和擦地板布，在这地平线外只有一种失望的没有办法，这种没有办法被饥饿搅扰得更没有办法。”（第 90 页）“地平线”这一意象的运用格外引人注目。因为爱尔兰每一位需要早起外出养家的穷苦大众都会注意到这条太阳日复一日升起的“地平线”，自然之物所引发的是集体对日常生活的感知和想象，是集体对穷困所造成的饥饿的焦虑和恐惧。在另外一面，爱尔兰小伙子给他的邻居的深刻印象同样是因为饥饿造成的饭量之大。“那个少年仿佛有一个极大的饭量，卡弗蒂太太说起他的饭量来，恭敬的像谈什么极大的、极可怕的东西似的……因此他的到来不但不能免去她想要躲避的破产，这破产反而来得更快、更凄惨了。”（第 147 页[10]）当斯蒂芬斯用“极大”、“极可怕”来形容这个小伙子的惊人饭量时，历史的重负便如雷云般滚滚而来，积聚在这简洁而又震撼的描绘性语言之上。没错，除了爱尔兰大饥荒和当下生活的贫穷状态，再没有任何事物足以配得上这一形容。集体的历史回忆和共在的生活感受如此这般地侵蚀着拟现实主义的美学风格。在小说中，斯蒂芬斯对饥饿和饥饿感的叙述带有明显的历史逻辑。一个丧失了饥饿感的人只能颓废而麻木地生活，而从饥饿到吃饱再向食物的思想转换则意味着永恒与苦难结伴的人类将得到彻底地解放和道德的救赎，人类的历史也将再次实在化。所以，斯蒂芬斯指出：“要使爱尔兰和人类复活吗？那也做得到。”（第 196 页）在这种饥饿的历史逻辑中，两性之间错综复杂的情爱关系就对爱尔兰支离破碎的文化现实起到了一种表征和整合的作用。大饥荒对爱尔兰的文化状况影响深远，它不但造成了大量移民的涌现从而在铸就英裔爱尔兰文化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而且本土农民在大饥荒历史中的生存也与其独特的继承文化相互结合，共同淬炼了爱尔兰的民间文化和天主教文化。所以说，当伪善的官方殖

民文化、优越的英国文化、精英式的英裔爱尔兰文化与爱尔兰本土文化如同阴霾一样恒久地盘踞在都柏林的上空时，饥饿与饥饿感的主题便成为了探索爱尔兰民族文化的一把秘钥。因此，卡弗蒂太太、莫须有太太和玛丽三位女性对小伙子的饭量流露出了理解、认同和怜悯的情感态度；（第147、148页）莫须有太太最终凭借一笔朝思暮想的意外之财让坠入爱河的两人摆脱了贫穷和饥饿，这样的场景和情节设置并非作家的无意之笔或异想天开。因为通过两性结合的爱情隐喻，斯蒂芬斯实际上是在对深受苦难折磨的爱尔兰民族文化的未来状态做出一种理想性的文学允诺。

4. 错位意指实践的文化社会学意义

经过上述分析，本文已经对《玛丽玛丽》在新文化运动语境中可能触及的相同主题进行了爱尔兰民族文学复兴语境的还原。这表明意指实践的原有文化意义和时空环境已经得到再现性的处理。因为詹姆斯·斯蒂芬斯的文学实践主要倾向于探索爱尔兰民族文化的总体走向，所以《玛丽玛丽》中拟现实主义的美学风格、爱情和饥饿的主题在爱尔兰民族文学复兴的语境中与民族共同体的想象直接相关。而异域的翻译和出版意味着作品将进行一次文学的旅行。在这一过程中，由于时空变化和社会文化的差异，意指实践发生错位是普遍存在的现象。在《玛丽玛丽》的文学旅行中，中文版的文学、社会文化意义实际上已经发生显著改变。拟现实主义的美学风格被全面地放置在了现实主义的框架中进行评价，导致《玛丽玛丽》的文学成就受到相对忽视。而小说中的两性关系及爱情主题则错位地被五·四时期中国社会结构和伦理道德的转型需求所片面地重视和阐释。但即便如此，以《玛丽玛丽》为代表的西方爱情主题文学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接受群体的影响和塑形却是真实存在的。因此，对《玛丽玛丽》的错位意指实践的文化社会学分析是有必要的。而考察具体的社会文化语境以及特定的接受群体就成为了探讨这种错位现象的文化社会学意义的重要途径。考虑到以社会学统计方式来分析《玛丽玛丽》自国内首次出版以来的接受群体的困难性，本文对《玛丽玛丽》接受群体的界定将首先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接受群体出发进行文化的总体描述。其次，再根据该作品显文本中最具有吸引力和冲击力的爱情主题来确定更为具体的接受群体。如此，结合民国时期的社会文化背景，本文对《玛丽玛丽》的接受群体方能有一个大致的印象，而其意指实践错位的文化社会学意义也将得到有效地呈现。

曾虚白先生曾在对一九二八年以前新文化运动的出版物进行统计后总结道：

“这个‘贫’字可以包括一切关于文艺的人和物说。最容易发现的当然是出产物的贫。自从新文化运动开始以至今日，十多年来努力的结果，称得起有文艺性的作品，只有二百多种译本，一百多种创作，并且这是没有一些批评眼光的统计，凡是文艺作品，好的，坏的，一股脑儿搜集在一块儿的总数。拢总四百多本书的一个小贡献，却大吹大擂的什么界什么坛的在人们面前夸耀，正像一个苦叫化的在那里做画栋雕梁的黄金梦，我实在觉得满身起了鸡皮肤，有些受不了了。”[11]

引文需要关注的并非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文学出版实绩到底如何的问题，而是曾虚白先生这样评价的原因以及评价的视角。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场由知识分子发起的社会文化变革运动，它对中国由传统以家庭一血缘为基础的社会结构向以公民为基础的现代民族国家的社会结构转型起到了非常深远的影响。由于新文化运动以知识分子为主体，所以它所产生的社会效应往往直接作用在现代教育体制的各类学校中。一方面，这是因为言传身教的师生关系起着不可忽视的示范作用；而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识字及知识群体在各类学校最为集中。因此，当国民教育还远未普及的时候，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力便在识字、知识群体中最为突出地显现出来。而曾虚白先生对于文学实绩的评价显然是根据社会的整体基础做出的。“什么界什么坛”的文化现象是针对文学场域内部对文学价值和文学实践所做出的批评。而“苦叫化的黄金梦”则是曾虚白先生针对新文化运动的总体文化期许及其在社会民众中传播的实际效应做出的评论。在这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接受群体已然浮现出来。另外，在新文化运动中，自由恋爱的文化社会学意义在于，它强烈冲击着家庭一血缘的社会基础和以此基础构建的伦

理道德体系。所以爱情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文学翻译和文学创作活动中一直是一个经久不衰的主题。即便徐志摩将对《玛丽玛丽》的翻译视为偶成的译作，但小说在当时社会历史语境出版和接受的针对性和现实性却是不容置疑的。不过，这场错位的意指实践突显出来的问题在于，当知识群体脱离文学的自主场域时，他们经过西方文学现代性洗礼的思想观念往往与整体的社会文化现实格格不入。自由爱情的社会实践不但举步维艰，而且它对知识群体的心灵和生活更是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鲁迅、胡适、闻一多，徐志摩等人都察觉到了这种错位的意指实践所带来的复杂性并在其文学创作中给予了关注和思考。特别是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形成的知识青年群体来讲，由于他们的思想形态尚不稳定，又缺乏相应的社会资本来缓解现实的冲击，所以意指实践的错位性在知识青年群体中形成了尖锐的悖论。这在五·四年轻一代诗人——汪静之的诗歌创作中表现得异常醒目。汪静之的诗歌以吟咏爱情而为人称颂，经典的文学史论述往往重视的是他作为青年人敢于打破传统道德枷锁，倾诉浪漫、美好爱情的勇气和率真；但事实是，在他的诗集中，有不少诗歌同样反映了爱情的沉重以及它所面对的社会文化冲突。现部分引述《我都不愿牺牲哟》[12]如下：

“.....

伊是个呀——爱之女神！
我怎能忍得住
伊那呈爱的表情的面庞？
伊是我灵魂的安慰者，
伊是我生命的寄托者，
我没有了伊，
恐怕再也活不了了！

.....

我还有一个伊——
仅是爹妈的媳妇——
我和伊是不自然地牵合着，
爹妈不允我割离伊。
我是微弱无力者！
我纵有力.....
那么，父的爱母的爱永沉没了！
‘宁可牺牲老辈，
不当牺牲少年的将来。’
这是大哲学家示给我的话，
恕我不能这样做到哟！
呀！我牺牲哪个呢？
——他们的爱么？
——伊的爱么？
唉！我都不愿牺牲哟！
我都不愿牺牲哟！”

“我和伊是不自然地牵合着，爹妈不允我割离伊。”引文所反映的现象不能仅仅简化为所谓封建社会的落后性及其对自由恋爱婚姻的束缚。作为对两性结合过往经验的总结和表达，前现代婚姻形式的合法性依据根植于传统的社会形态中。所以，在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内，这种婚姻形式对社会民众来说始终是有效的。而且，从大众经验的概率性讲，父母门当户对地包办子女婚姻为子女带来婚后幸福生活的可能性也是最高的。因此，诗歌中反映出的代际伦理冲突的文化社会学原因在于，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由于社会主导性结构发生的根本转变依旧缓慢，所以传统婚姻形式向现代自由婚姻转型的过程相较于社会文化观念的更替出现了时间的滞后性。即通过翻译和出版，在失去了原有文化效应的过程中，包括《玛丽玛丽》

在内的西方文学的意指实践，已经针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语境错位地塑形出了知识青年群体的现代爱情观。于是，汪静之的爱情诗不仅仅成为了无数知识青年在自由恋爱之路上心酸、无奈地抗争和绝望的写照，也是社会结构转型的个体代价和代际伦理冲突的真实缩影。

5. 结论

综上所述，错位的意指实践对不同文化社会的接受群体起到了迥异的塑形作用。19 世纪 80 年代，简·王尔德夫人和她的儿子王尔德（Oscar Wilde）便先后供职于一家为独立女性创办的文化杂志《女性世界》，这暗示出《玛丽玛丽》涉及到的女性主义及爱情观念的现代社会基础在都柏林和伦敦已经逐渐完备。所以爱尔兰文学语境并未刻意偏重这一主题，取而代之的则是强调民族文学复兴语境中的身份认同问题。但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尚待转型的中国社会亟需现代性的女性主义思潮和爱情观作为社会结构和伦理道德的突破口。因此，五·四知识青年群体就在历史的推动下担负和实践着这一使命。而错位的意指实践便成为了他们心路历程的一个注脚。

References

- [1]. James Stephens, *The Charwoman's Daughter*, trans. Xu Zhao & Shen Xing Ren, Changchun: The Time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2012.
- [2]. Chen Shu, "Irish Literary Studies in China in a Centennial Retrospect", in Feng Jamming, ed, *The Study of Irish Writers and Ireland*, Shanghai: Shanghai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11, pp. 235-257.
- [3]. J. Timed, *Bloom's Literary Places Dublin*, trans. Bai Yue & Dou Hugli, Shanghai: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 124-131.
- [4]. James Stephens, *The Charwoman's Daughter*, *ibid.* p 201.
- [5]. George Joseph Watson, *Irish Identity and the Literary Revival*, London: Crook Helm Ltd.1979, p. 24.
- [6]. J. Timed, *Bloom's Literary Places Dublin*, *ibid.* p. 127.
- [7]. 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trans. Wu Rueben,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11, p.39.
- [8]. Terry Eagleton, "Form and Ideology in the Anglo-Irish Novel", in Mary Masood, ed., *Literary Inter-relations: Irish, Egypt, and the Far East*, London: Colin Smyth Limited, 1996, p. 135.
- [9]. James Stephens, *the Crock of Gold*, London: Macmillan Publisher, 1986 [11912], p. 86.
- [10]. James Stephens, *The Charwoman's Daughter*, *ibid.* p. 342.
- [11]. Chen Zhan, *the Change of Chinese Modern Literature and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Last Thirty Years*, Shanghai: Shanghai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2000, pp. 316-317.
- [12]. Fee Bai et al., eds, *Collected Works of Wang Jinzhou the Volume of Poetry*, vol.1, Hangzhou: Exiling Seal Engraver's Society Publishing House, 2006, pp. 70-71.